

分工、均势经济与共同富裕

向国成 谌亭颖 钟世虎 王雄英 江鑫*

摘要 本文秉承亚当·斯密的分工与普遍富裕思想,以分工结构演化为主线,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建立自给自足不超越温饱水平的理论基准,阐明分工发展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提出基于斯密—杨格定理的共同富裕经济理论框架性体系,将正义秩序、生产力水平(亦即供给侧)和共同富裕程度(亦即需求侧)纳入循环累积因果的理论链条中,形成基于分工演化的均势经济理论模型。基本结论是如果经济发展能够不断逼近基于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的完全分工的均势经济状态,共同富裕将会伴随财富总量增长而最终实现。因此,改革与政策制定要有利于这种均势经济格局的形成。

关键词 分工 均势经济 共同富裕 超边际分析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紧迫问题。本质上,这是公平与效率的两难矛盾,相关理论归纳起来,主要是三个基本方面:正义秩序、经济增长(或充分就业)和收入分配。形成正义秩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实现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调剂收入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工具。其中,正义秩序既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如是否存在行政权力对收入分配的扭曲),又通过经济增长与就业(如市场秩序是否公平正义、就业机会是否平等以及对自由的扩展)而影响收入分配。关于正义秩序,本文采用阿玛蒂亚·森(Sen,1999)的观点,他认为自由是个人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的能力,发展正是这种自由的扩展,正义秩序是有利于这种自由扩展的秩序。在正义秩序确立之后,就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

自库兹涅茨(Kuznets,1955)提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变化趋势的“倒U”型假说以来,理论界围绕该假说的经验实证与理论逻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有一些研究支持该假说(如Paukert,1973;Chenery and Syrquin,1975;李实和赵人伟,1999),而另一些则不支持(John,1979;Deininger and Squire,1998)。该假说存在的理论逻辑主要

* 向国成,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共同富裕研究中心,E-mail: gexiang@hnust.edu.cn,通讯地址:湖南省湘潭市桃园路2号湖南科技大学社科处,邮编:411201;谌亭颖,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共同富裕研究中心,贵州财经大学,E-mail: 80356933@qq.com;钟世虎(通讯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E-mail: 1010776114@qq.com;王雄英,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共同富裕研究中心,E-mail: 790196911@qq.com;江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E-mail: hnust1949@163.com。鸣谢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1JZD018)的资助。感谢姚顺添、黄有光、童乙伦和匿名审稿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有两个:(1)依据部门生产率的差别及部门转型进程的水平来解释。典型的是刘易斯(Lewis,1954)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传统经济社会向现代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会出现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由于现代部门的生产率比传统部门高,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将会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上升,但随着现代部门发展以及对传统部门的改造,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现代部门,二元经济结构消失,收入分配差距就会缩小。陈宗胜(2000)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对收入差别的影响,提出了“公有制经济收入差异倒U曲线”。(2)依据分工内生的生产力差别及分工演进程度来解释。杨小凯和赖斯(Yang and Rice,1994)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城市化一般均衡模型,揭示城市起源和城乡分离都是分工演进的结果,由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易距离比农村居民要短得多,其交易效率也就更高,城市居民的专业化水平和生产力就比农村居民高得多,在经济从低水平分工向高水平分工过渡的转型阶段,用生产力差别和商业化收入差别表示的城乡二元结构就会发生,但演进到完全分工阶段,收入差别就会消失。张定胜和杨小凯(2004)进一步指出,二元经济不是工业、农业之间的二元,而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二元,那些交易条件好,且先卷入分工体系的人,收入水平先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当所有人卷入分工体系时,收入不平等程度将会下降;而当交易条件较好的人们在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时选择更高的分工水平时,他们与落后的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又会扩大,而当落后的人们又赶上来时,收入差距又会缩小。所以,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呈现不断波动的特征。

上述成果解释了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反过来,关于收入(或财富)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聚焦于土地等有形资产、人力资本和性别的不平等程度与随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Alesina and Rodrik,1994; Birdsall and Londono,1997)。从构建共同富裕的经济理论体系来看,这些研究还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但分别提供了这个有机体中的许多片段。正义秩序、经济增长(或充分就业)和收入分配本是内在统一的互动体系,而在这一体系的逻辑链条中,新古典经济理论缺少了分工这一关键环节。正义秩序可以通过分工水平影响经济增长与就业,进而影响收入分配,或通过收入分配影响分工水平,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与就业;而分工本身反过来又可能内生或强化正义秩序。本文将尝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秉承亚当·斯密的分工与普遍富裕思想,吸收杨小凯、黄有光的超边际经济学理论成果,以分工演化为核心逻辑,构建共同富裕经济理论框架。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建立自给自足最优产出理论基准,阐明分工发展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第三节构建基于斯密—杨格定理的共同富裕经济理论框架;第四节建立基于分工演化的均势经济理论模型;最后为主要结论。

二、理论基准与斯密命题:分工在一定条件下导致普遍富裕

(一) 理论基准:自给自足的最优产出不会超越温饱水平

首先,我们给出关于温饱水平的理论界定:满足当下“衣暖食饱”的需要,且略有储备。根据历史经验,在自给自足条件下,即使其他生产资源是无限的,由于劳动时间稀缺,能够自己提供的产品种类数仍然非常有限,产品多样化达不到富裕程度,主要是解

决温饱问题。就生产一种产品而言,我们考察自给自足条件下,一定时期内(如一年)的最优产出水平会不会超过温饱水平。

假设:(1)其他生产资源无限可用,但劳动时间稀缺。这样,就可以把产出视为只是劳动投入的函数,且规模报酬不变。(2)效用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进行两期的生产和消费,时间价值的贴现率为 r 。因此,对第二期消费和闲暇需要进行效用贴现。(3)每个人消费粮食这一种产品,第一期消费量必须大于等于最低生存条件(用 x_0 表示),超过部分可以延期到第二期消费。(4)只生产粮食一种产品,每期满足温饱水平的粮食(用 x 表示),既可以当期生产,也可以在第一期全部生产出来。如果是后者,用于第二期消费的粮食存在变质浪费问题,就需要考虑损耗系数 $\gamma(0 < \gamma < 1)$ 。因此,第一期生产用于第二期消费的粮食(用 x' 表示)就要大于 x ,但扣除损耗(设损耗系数为 γ)后,两者相等 $[(1-\gamma)x' = x]$ 。生产 x 的劳动量用 l_x 表示,生产 x' 的劳动量用 $l_{x'}$ 表示,且 $l_{x'} > l_x$ 。(4)闲暇用 y_i 表示(i 代表第1、2期),是时间(h)和劳动(L_x)的函数。效用函数、闲暇函数、生产函数如下:

$$U = u_1 + u_2 \quad (\text{总效用函数})$$

$$u_1 = x^\alpha y_1^{1-\alpha} \quad (\text{第一期效用函数})$$

$$u_2 = \frac{x^\alpha y_2^{1-\alpha}}{1+r} \quad (\text{第二期效用函数})$$

$$x = l_x, x' = l_{x'} \quad (\text{生产函数})$$

$$y_i = h - L_x; L_x = \begin{cases} l_x & \text{当期生产当期粮食的劳动时间} \\ l_x + l_{x'} & \text{第一期生产两期粮食的劳动时间} \end{cases} \quad (\text{闲暇函数})$$

由以上函数,可以得到每期满足温饱水平的粮食(x)在当期生产(U_1)和在第一期全部生产出来(U_2)两种生产结构的总贴现效用水平。

$$U_1 = x^\alpha (h - l_x)^{1-\alpha} + \frac{x^\alpha (h - l_x)^{1-\alpha}}{1+r}$$

$$U_2 = x^\alpha (h - l_x - l_{x'})^{1-\alpha} + \frac{x^\alpha h^{1-\alpha}}{1+r}$$

比较 U_1 与 U_2 ,当(1)第一期的最低消费量不低于 $x_0 = h [(1+r)^\alpha \lambda - 1] / (1+r)^\alpha (1 + \lambda)$,且(2)粮食损耗系数范围为 $1 > \gamma > (1/1+r)^\alpha$ 时,前者始终大于后者,即每期只生产满足当期温饱水平的粮食量。其中的道理是,第一期把两期消费的粮食全部生产出来,由于存在粮食损耗系数,耗费更多的劳动时间($l_{x'}$)才能得到第二期温饱水平的粮食消费量(x),同时减少了两期闲暇总时间($l_{x'} - l_x > 0$),导致总效用水平下降。

综上所述,在自给自足条件下,一方面,能够提供的产品种类数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即使全部劳动时间可用于生产一种产品,在最低生存条件和损耗系数约束下,其最优产出水平也只是满足当期温饱需要。这一答案与自然经济的发展历史基本吻合。将其上升到理论基准的高度,有利于找到发展方向:要超越温饱,迈向共同富裕,分工发展是必由之路。例如,在过去多年的扶贫工作中,“输血”式扶贫应该说成效不小,但离社会的目标要求还有不少距离,原因就在于这种扶贫方式本质上是一种自给自足式扶贫,充其量只能解决当下的温饱问题,不能解决小康富裕问题。从现实来讲,当前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富裕的小康水平,扶贫方式就应该主要采取分工式扶贫,把贫困人口纳入更广阔的分工体系中

来 找准了分工位置 哪怕只提供一种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或服务 就可能变得富裕!

(二) 斯密命题: 分工在一定条件下导致普遍富裕

早在 240 年前, 亚当·斯密就提出了“分工导致普遍富裕”的基本命题“在一个政治修明(a well-governed)的社会中, 造成普及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universal opulence)^①情况的, 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 除自身所需要的外, 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 同时, 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处境相同, 各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别人所需的物品, 他能予以充分供给; 他自身所需的, 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于是, 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亚当·斯密, 1776: 11) 这段话包含了三层含义: 政治修明是普遍富裕的重要条件, 我们把政治修明拓展理解为正义秩序; 分工导致各行各业财富总量的增长, 这是普遍富裕的经济基础; 每个劳动者都充分就业和充分供给, 并通过产物交换实现普遍富裕。在《国富论》中, 亚当·斯密用较大篇幅论述了工资、利润、地租、君主收入等与普遍富裕密切相关的分配问题。

梳理经济思想史, 就会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忽视了“分工导致普遍富裕”的斯密命题, 正如斯蒂格勒所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几乎没有人运用分工理论。”(Stigler, 1976: 1209)。只是到了 2008 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后, 才有少数学者认识到“普遍富裕”在《国富论》中的重要地位, 托尼(Tony, 2010)在 2009 年欧洲经济思想史联合会和澳大利亚经济思想史联合会会议上, 宣读了题为“普遍富裕: 斯密论技术进步和真实工资”的论文, 指出普遍富裕构成《国富论》这一史诗巨著的关键。《国富论》实质是关于普遍富裕的理论。

三、分工内涵与理论模型: 基于斯密—杨格定理的共同富裕经济理论框架

自亚当·斯密确立分工在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以来, 分工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变化经历了好比“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马歇尔之后, 分工几乎淡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 但到 20 世纪 80 年代, 以报酬递增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 揭示了分工是报酬递增的重要源泉; 新制度经济学重新把经济组织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而组织总是离不开分工; 与分工及其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角点最优解的求解方法——“库恩—塔克定理”——这一数学工具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发展出来。如此, 重新确立分工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就势在必行, 一个以分工为核心范畴, 以分工演化为主线, 以报酬递增和超边际分析为主要特征, 在一般均衡框架下, 在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等一系列两难冲突折中中形成的超边际经济学理论体系诞生了(向国成和韩绍凤, 2007a; 2007b)。它不仅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 而且在吸收现代经济学思想基础上, 对分工经济理论乃至整个经济学体系做出了重大发展。

^① “universal opulence”也可以翻译为共同富裕, 本文在内涵无差异上交替使用这两个词。

(一) 分工内涵及其与经济学四个基本问题的关系

从分工这个理论范畴之所以能够演化出一个经济学体系,关键是立足于分工范畴能否回答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为谁生产这四个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这又取决于对分工内涵的界定。对分工内涵的一般性界定是“按不同技能或社会要求分别做各不相同而又互相补充的工作”,“把经济系统中的任务分开以便参与者能够专业化”。这些界定仅仅基于微观直觉,只突出了劳动专业化这一个方面(尽管这是最基础的方面)。根据超边际经济学理论,向国成和韩绍凤(2007b)从宏观结构上把分工界定为是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的统一。它们与经济学四个基本问题的关系如下所述并见图1(向国成和李真子,2016):

1. 劳动专业化:生产多少

劳动专业化是指一个主体所从事的专业数的多少,如果他在其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从事的专业数越少,表示专业化水平越高。一个社会专业化程度提高意味着在这个社会中至少有一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而其他人的专业化水平不变或也增加。劳动专业化可以发挥规模效应、学习效应和创新效应,将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本质上对应的是经济学中生产多少及质量改进的问题。

2. 专业多样化:生产什么

专业多样化是指一个社会产业、产品、技术、职业、结构等方面的多样化,它对应的是经济学中生产什么的问题。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专业多样化,既可以自力更生而得,也可以通过交换获得。如果通过交换,即扩展市场范围,有利于扩大参与交易的总人口和市场需求总量,进而通过市场规模化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和研发成本(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如果自力更生,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包括就业人数),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产品产业的种类数越多,越有利于把自给自足者甚至失业者纳入分工体系,提高参与分工者的效用水平或真实收入水平,缩小全社会收入差距(韩绍凤、向国成和汪金成,2007)。此外,多样化有利于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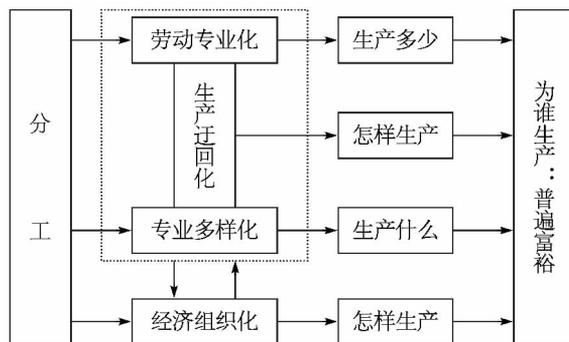


图1 分工与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关系

劳动专业化和专业多样化是分工的两个基本方面。如果社会中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都很高,但没有专业多样化,如每个人都只生产粮食而没有人生产其他产品,则这个社会没有分工;如果只有专业多样化,没有专业化,如每个人都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这

个社会就处于自给自足状态,也没有分工。所以,从宏观结构上看,只讲劳动专业化,或者只讲专业多样化,分工都不成立,这就是从微观视觉上把分工等同于专业化的局限性。

3. 生产迂回化:怎样生产

分工仅仅是劳动专业化和专业多样化还不够,还必须有生产迂回化。生产迂回化是间接生产方式的发展,是用中间产品来生产最终产品,是中间投入品(包括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等)和生产链的发展,这也是分工发展的重要方面,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主要分工经济形态(Young, 1928)。其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是:(1)下游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随着投入生产下游产品的上游中间产品的数量增加而提高;(2)下游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随着上游中间产品种类数增加而提高;(3)最终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随着中间产品迂回生产链条的链条个数增加而提高(杨小凯, 2003:376)。如果没有迂回生产,不借助中间投入品,最终产品生产效率就可能很低,没有人能够生产出超过自己需要的剩余产品,没有为市场而生产的能力,交换就不能进行,同样没有分工或市场分工。庞巴维克指出:“迂回的方式比直接的方式能得到更大的成果,这是整个生产理论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命题之一。”(庞巴维克, 1964:55)。生产迂回化对应的是经济学中怎样生产的问题。

4. 经济组织化:怎样生产

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可以看作是生产力的方面。随着这些方面的发展,势必产生人与人之间的组织问题,经济组织化可以看作是生产关系的方面。与理论界一般把经济组织化理解为团队化、科层化不同,经济组织化是指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和制度协调分工从而使社会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的发展过程,是与封闭、孤立、缺乏联系的自然经济相对立的,是对自然经济状态的否定与超越(向国成和韩绍凤, 2007b)。在此意义上,组织化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组织的团队化,如政府、企业、工会、协会等科层组织的发展;二是组织的市场化,如市场主体之间通过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建立起来的买卖关系。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把科斯(Coase, 1937)关于“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的思想一般化,可以说团队化是市场化的替代物,也就是说如果两个及其以上本身有着市场联系的经济主体组成一个团队并把市场关系内部化,则团队取代了市场。在另一些情况下,也看到如果没有一定的团队化,没有相应的团队内的分工发展来提高生产和交易效率,一些经济主体根本就进入不了市场,建立不了与他人的市场联系,市场化就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团队化不仅是市场化的替代物,也是发展市场的工具。丹尼尔·F·斯普尔伯(1999)立足于中间层模型全面阐述了“厂商是协调消费者与供应商的市场制造者”的观点,其中包含了团队是发展市场的工具的思想。所有权、货币、保险、合同、城市、产业布局等,都是实现组织化的社会工具或载体。经济组织化是通过节省外生和内生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其对应的也是经济学中怎样生产(包括在哪里生产)的问题。

5. 普遍富裕:为谁生产

在正义秩序下,随着分工不断深化,社会各阶层将普遍富裕,这对应的是经济学中为谁生产的问题。遗憾的是,承接这一主题的现代福利经济学研究却恰恰偏离了这一宗旨,而将理论视角聚焦于如何构建和评价社会福利加总函数的数理分析。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分工这个范畴能够涵盖经济学的四个基本问题,围绕分工范畴

就能够演化出一套经济学体系。

(三) 基于斯密—杨格定理的共同富裕经济理论框架

1. 斯密定理: 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 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市场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 换言之, 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而市场广狭受制于: (1) 市场覆盖的人口规模与集中程度。斯密说“有些业务, 那怕是最普通的业务, 也只能在大都市经营。”(2) 交通运输的便利性、安全性。斯密说“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 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 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又有什么输送方法能使货物安然通过介在两地间的许多野蛮民族的领土呢?”(亚当·斯密, 1972: 16—18)。理论界把“分工受制于市场范围”称为斯密定理, 杨格将其视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是最有阐释力并富有成果的普遍原理之一”(Young, 1928: 529)。

2. 斯密—杨格定理“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

杨格(Young, 1928)在其著名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中, 对斯密定理做出了重要发展。他把市场范围(the extent of the market)作了扩展性理解, 用市场规模(the size of the market)一词, 或者在市场规模的含义上理解市场范围。在斯密那里, 市场范围主要与人口规模有关, 而市场规模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 而是购买力, 即“吸收大量年产出的能力”。这又与生产力及收入水平相联系, 而生产力水平取决于分工水平。因此, 杨格说“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 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Young, 1928: 539)。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杨格定理”。斯密定理的本质是需求决定分工水平, 进而决定供给总量与种类, 而杨格看到了分工水平决定供给进而决定需求的内在逻辑。因此, “斯密—杨格定理”绝不是同义反复, 而是分工两个侧面——供给和需求——之间累进的因果循环关系, “萨伊定律”与凯恩斯需求理论都包含其中, 但不可偏废!

3. 共同富裕经济理论框架

综合以上论述, 可以绘出共同富裕的经济学理论框架(见图2), 由共同富裕及市场规模、分工水平、生产力水平和政府四大部分组成。关于共同富裕, 我们认为, 如果一定市场范围(一国或地区)内的人口, 整体收入水平比较高, 贫富差距不太大, 就代表共同富裕。其中, 之所以强调市场范围, 是因为没有纳入市场范围的人口, 处于自给自足状态, 不会超越温饱水平, 无富裕可言。因此, 要使一国或地区共同富裕, 就要把该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全部纳入市场范围, 这就要求形成覆盖全域的统一市场体系。一国或地区的共同富裕程度决定了该国或地区的市场规模, 构成分工的需求侧; 市场规模决定社会的分工水平; 分工水平决定生产力水平, 如经济总量及结构、就业总量及结构和劳动生产率等, 构成分工的供给侧; 生产力水平又决定市场范围、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等, 即共同富裕程度。这样, 就形成一个循环累积的因果链条。

在上述链条上, 任何一个环节、方面的改善都将促进共同富裕, 政府通过提供良好的交易秩序、分配秩序以及供给侧和需求侧其他体制政策来发挥重要作用。(1) 分配秩序。公平是社会制度变迁乃至经济发展的倒向砝码, 如果分配秩序牺牲了社会公平, 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 并造成社会周期性震荡, 那么, 它的微观效率乃至社会宏观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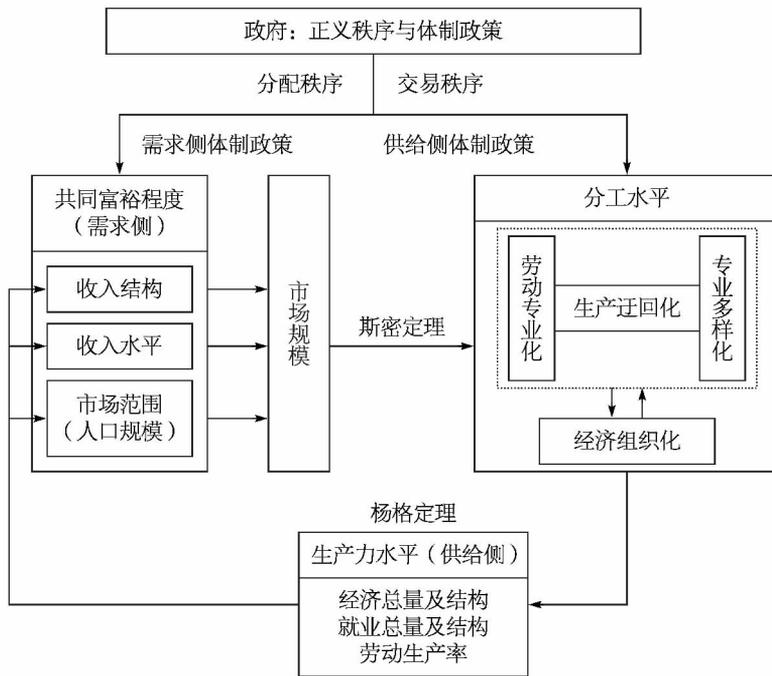


图2 基于斯密—杨格定理的共同富裕经济理论框架

率、它的短期效率乃至社会长期效率也就荡然无存(朱有志和向国成,1997)。面对较大的贫富差距,政府如果在缩小贫富差距上有所作为,将有利于扩大内需市场规模,进而深化社会分工,最终在更高水平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和促进共同富裕。(2)交易秩序。良好的交易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已为“西方世界的兴起”所证实(North and Thomas,1970)。而一个社会良好的交易秩序,如良好的社会信用制度、发达的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安全的经济活动环境、自由择业与迁徙等,这些都是政府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此外,(3)政府还可以在有关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体制与政策上发挥作用。

四、财富增长与共同富裕:走向基于完全分工的均势经济

(一) 直观描述与理论模型

1. 直观描述

分工可以从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经济组织化四个方面促进财富增长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由于生产迂回化并不给消费者带来直接效应,而是最终体现在最终产品生产效率上,为了使描述与模型简化,这里从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经济组织化(以市场化为例)发展来直观描述分工是怎样促进财富增长与共同富裕的。

假定一个经济中只有3个消费者—生产者,开始时只生产消费两种产品(1和2),如果每个人都选择自给自足,经济结构就如图3所示。在这种结构中,没有社会分工,没有社会供求,整个经济分成3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一体化程度低,生产集中度低,

每个人的专业水平低,从而生产率都很低,但完全没有交易及由此产生的交易费用。如果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社会分工出现,例如,A、B两个人之间分工,分别生产产品1、2,而生产者—消费者C处于自给自足状态,经济结构就如图4所示。在这种结构中,A、B两个人专业化水平上升,因此生产率上升;产品1、2的生产者人数从自给自足的3个减少到2个,生产集中度和垄断程度上升;出现了一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从而比自给自足时的多样化程度上升;部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在增加。同时,这种结构产生了交易费用,也在社会人群中形成卷入分工和非卷入分工的二元经济结构及相应的收入差距。这时,如果生产者—消费者C通过创新生产产品3,与A、B两人交换,社会步入完全分工状态,经济结构如图5所示。在这种完全分工状态下,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和垄断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商业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度、交易次数及交易费用、社会总生产力和需求规模都比局部分工增加,卷入分工和非卷入分工的二元经济结构及相应的收入差距消失,在更高生产率水平上实现了共同富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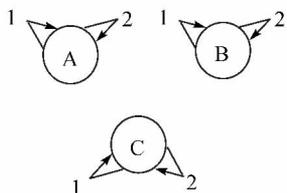


图3 自给自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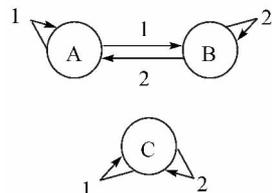


图4 局部分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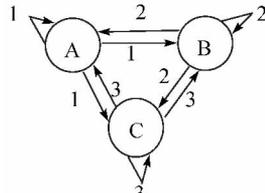


图5 完全分工

2. 均势经济理论模型

下面把上述直观描述一般化,构建基于分工演化的均势经济理论模型。理论假设:(1)社会中有 m 个人和 n 种最终消费品,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天生相同;(2)消费中存在消费多样化的好处;(3)在每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存在一个相等的固定学习费用,用 α 表示;(4)当消费者获得多样化消费的好处时,不会增加管理费用;(5)生产中只使用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为使问题简化,不考虑迂回生产),具有专业化经济,随在一种产品生产中劳动投入份额增加呈现报酬递增特征;(6)文定理(Wen,1998)认为,最优决策从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从不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最多卖一种产品;(7)每个人的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和时间约束都相同。

$$U = [\sum (x_i + kx_i^d)]^{1/\rho} \quad \rho < \rho < 0.5 \quad (1)$$

$$x_i^p \equiv x_i + x_i^s = \text{Max}\{l_i - a, 0\} \quad i = 1, 2, 3, \dots, n \quad (2)$$

$$\sum_{i=1}^n l_i = 1 \quad (3)$$

$$p_i x_i^s = \sum_{r \in R} p_r x_r^d \quad i \neq r \quad (4)$$

(1)式是效用函数, U 代表效用水平,其中 x_i 表示生产 i 产品的自给量, x_i^d 表示对 i 的购买量。根据文定理,每个人至多卖一种产品,如 x_i^s ,则购买的其他产品用 x_r^d 表示。 k 表示交易效率,即购买一单位产品实际所得比例,反映外生与内生交易成本状况。 ρ 表示替代弹性参数,可以计算消费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 $1/(1-\rho)$,由于替代弹性和互补经济程度

之间存在一种逆关系,而替代弹性与参数 ρ 之间是正向关系,所以定义 $1/\rho$ 为消费品之间的互补经济程度,即消费多样化经济的程度,为了保证多样化经济,设 $0 < \rho < 0.5$ 。

(2) 式是 CES 生产函数, x_i^p 是产出水平; x_i^s 是 i 产品的出卖量, a 是生产每种产品的固定学习费用。

(3) 式是劳动禀赋, l_i 是生产 i 产品的劳动份额, 反映生产 i 产品的专业化水平, 每个人的劳动时间禀赋都是 1 个单位。

(4) 式是预算约束, p_i, p_r 分别代表 i 和 r 产品的价格, x_r^d 是 r 产品的需求量, r 为所购买商品的集合。

(二) 角点均衡与超边际比较静态均衡分析

1. 三种结构的角点均衡信息

在 $m \times n$ 的格局中, 存在无数结构, 结构均衡的存在性为孙广振和杨小凯、周林 (Sun, Yang and Zhou 2004) 所证明。利用文定理可以排除许多无效结构, 对于一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集是一个连续统的经济而言, 如果个人的偏好是理性的、连续的和凸的, 生产具有专业化经济, 个人的劳动时间是有限的, 那么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存在, 并且它就是帕累托最优角点均衡, 这被称为姚定理 (Sun, Yang and Yao, 1999)。为了使问题尽可能简化, 又不影响对问题的阐述, 这里只求与图 3、图 4、图 5 结构类似的角点均衡信息。

(1) 自给自足结构 (A)。此结构中每个人的产品自给量、专业化水平及实际效用水平 (真实收入) 如下:

$$x_1 = x_2 = \dots = x_n = \frac{1 - na}{n}; \quad l_1 = l_2 = \dots = l_n = \frac{1}{n}; \quad U_A = n^{\frac{1-\rho}{\rho}} (1 - na)$$

(2) 局部分工结构 (B)。假设人口数 (m) 比产品种类数 (n) 多 1 个, 其中, 有一个人被排除在分工之外, 自给自足, 其余 n 个人完全分工。自给自足者的产品自给量、专业化水平及实际效用水平等同于自给自足结构, 其余 n 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产品自给量、供给和需求函数如下:

$$l_{ji} = 1; \quad x_{ji} = \frac{k^{\frac{\rho}{\rho-1}}(1-a)}{n + k^{\frac{\rho}{\rho-1}}}; \quad x_{ji}^s = \frac{n(1-a)}{n + k^{\frac{\rho}{\rho-1}}}; \quad x_{jr}^d = \frac{1-a}{n + k^{\frac{\rho}{\rho-1}}}$$

利用市场供求均等和效用均等条件, 可以求解其余 n 个人的实际效用水平 (真实收入):

$$U_B = k(1-a)(n-1 + k^{\frac{\rho}{\rho-1}})^{\frac{1-\rho}{\rho}}$$

(3) 完全分工结构 (C)。假设由于创新导致新增加一种产品, 产品种类数与人口总数与相等 ($n = m$) m 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产品自给量、供给和需求函数、相对价格如下:

$$l_{ji} = 1; \quad x_{ji} = \frac{k^{\frac{\rho}{\rho-1}}(1-a)}{m + k^{\frac{\rho}{\rho-1}}}; \quad x_{ji}^s = \frac{m(1-a)}{m + k^{\frac{\rho}{\rho-1}}}; \quad x_{jr}^d = \frac{1-a}{m + k^{\frac{\rho}{\rho-1}}}; \quad \frac{p_i}{p_r} = 1$$

利用市场供求均等和效用均等条件, 可以求解每个人的实际效用水平 (真实收入):

$$U_C = k(1-a)(m-1 + k^{\frac{\rho}{\rho-1}})^{\frac{1-\rho}{\rho}}$$

2. 结构演化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均衡分析

比较结构 U_A 和 U_B , 当交易效率 $k > k_1 = \left[\frac{n \left(\frac{1-na}{1-a} \right)^{\frac{\rho}{1-\rho}} - 1}{n-1} \right]^{\frac{1-\rho}{\rho}}$ 时, $U_B > U_A$ 。这意味

着: (1) 随着交易效率提高, 自给自足结构将演进到局部分工结构; (2) 除一个人的收入不变之外, 其他所有人的收入都增加, 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3) 尽管自给自足结构中所有人的真实收入是均等的, 但这是低水平的均等, 而在局部分工结构中出现的卷入与非卷入分工的二元经济不均等情况, 是生产力水平提高过程中的过渡现象^①。

比较完全分工结构和局部分工结构, 当交易效率 $k > k_2 \equiv \left[\frac{n \left(\frac{1-na}{1-n} \right)^{\frac{\rho}{1-\rho}} - 1}{m-1} \right]^{\frac{1-\rho}{\rho}}$, 且

$m > n$ 时, U_C 大于 U_A 和 U_B 。这意味着: (1) 创新导致产品种类数增加, 产品种类数等于人口数, 经济结构演进到完全分工结构, 把自给自足者纳入分工体系, 卷入与非卷入分工的二元经济结构最终消失, 实现基于劳动专业化和专业多样化基础上的充分就业。(2) 通过多样化发展(如新增1种产品), 带来多样化消费的好处, 实现完全分工结构所要求的交易效率门槛比局部分工结构低, 即 $k_2 < k_1$, 这正说明创新对深化分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 与自给自足结构比较, 每个人每种产品的生产力都极大提高, 由 $(1-ma)$ 上升到 $(1-a)$, 每种产品的社会总产量由 $\left(\frac{1}{m} - a\right)$ 上升到 $(1-a)$, 因为专业化节省了全社会的固定学习费用。(4) 每个人都是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者, 也都是某种产品的垄断者(每种产品都集中在不同的个人生产)。(5) 相对价格等于1, 意味着每个人都具有均等的市场支配力, 形成均势经济格局, 都获得均等的真实收入。在更高水平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共同富裕! (6) 结构演化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均衡分析表明, 理论上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可能性。如果一个社会从自给自足经过局部分工演进到完全分工, 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就会呈现“倒U”型关系; 如果一个社会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局部分工而最终又不能实现完全分工, 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可能就不会呈现“倒U”型关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实证分析支持“倒U”型假说而另一些实证分析又不支持, 可能是研究对象(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或不同组群)的社会分工程度不同或处于不同的社会分工阶段(这需要下一步进行实证分析)。

(三) 均势均衡与均势经济

关于均势(balance of power)及其理论问题, 更多的研究体现在国际政治关系理论之中, 而在经济学中, 至少没有十分明确和系统地加以研究。均势不能与经济学中的均衡画等号。例如, 在卖方市场中, 产品短缺, 卖者占支配地位; 在买方市场中, 产品过剩, 买者占支配地位。这两种市场都存在市场均衡, 但在买者与卖者之间不存在均势。又如, 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垄断市场, 也存在市场均衡, 但不存在均势。我们把市场均衡分为

^① 关于二元经济结构, 基于客体视角, 有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城市与乡村、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划分, 本文基于主体视角, 将经济群体划分为卷入分工体系与非卷入分工体系的二元群体。那么, 在传统部门与乡村的人可能因卷入分工体系而变得富裕, 因卷入分工体系程度不同而富裕程度不同。

两类:一类是市场支配力非对称的市场均衡,另一类是市场支配力对称的市场均衡。怎样衡量市场支配力的对称性?可以用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来衡量。如果市场支配力越对称,生产者生产的不同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就越接近于1;如果相对价格偏离1越远,就说明生产者之间的市场支配力越不对称。我们把消费者—生产者之间市场支配力对称、相对价格接近甚至等于1的市场均衡定义为均势均衡(equilibrium of balance of power)是经济关系中参与主体之间形成的一种势均力敌、平分秋色的经济状态。均势经济(economy of balance of power)既指经济关系的这种均势均衡状态,也指有利于经济关系中参与主体形成均势均衡状态的经济行为与活动,是这些行为、活动与状态的总和。

均势经济一词几乎没有在文献中发现,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经济学没有研究均势经济问题。例如,基于工会提高工人的谈判力量导致工资刚性的黏性工资理论(实质就是关于劳资关系的均势经济问题),垄断企业分拆和价格管制的反垄断理论(实际上是改变供求关系中的非均势经济程度),研究信息不对称的信息经济学理论(实质是研究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非均势经济问题)等等,都涉及均势经济问题^①。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创新垄断与生产效率、共同富裕不能共存。例如,在完全竞争理论模型中,同质产品的生产者都是价格接受者,都没有市场支配力,这是一种没有市场支配力的均势状态,自然不能与创新垄断共存。而在垄断理论中,垄断不仅不能与共同富裕(垄断者获得更多剩余)共存,而且导致生产效率损失。之所以如此,这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和方法有关:(1)假定消费者不生产、生产者不消费,消费者与生产者双重身份绝对分离,市场和企业的存在是外生给定的,每个人不能选择自给自足模式,没有退出市场的选择。因此,在理论上就抛弃了退出权这一均势约束机制。(2)采用局部、静态和边际分析方法,孤立地研究单个市场的结构、供求关系、效率和均衡,这个市场的参与者不能向其他市场转移,更没有创新去实现熊彼特式的经济发展“新组合”(熊彼特,1990:76),只研究既定稀缺资源如何最优配置,而不解决资源稀缺程度本身的问题^②。但是,随着交易效率不断提高,分工结构将发生变化,市场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生产力、市场容量(总量供求)与价格会随之变化,创新垄断与生产效率、共同富裕的兼容发展空间也会得到极大拓展^③。不过,这需要基于分工网络发展的整体、结构和超边际分析方法。

(四) 均势经济与共同富裕

在上述基于分工演化的均势经济理论模型中,达到完全分工的均势均衡状态时,实现了创新垄断与生产效率、共同富裕的统一。(1)建立在创新和报酬递增基础上的垄断不会带来效率损失,反而提高了全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创新垄断与生产效率兼容。这实际

① 在国内,阎潜(1986)最早提出均势市场概念,梅志罡(2000)解剖了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均势型村治问题,廖成林和孙洪杰(2003)探讨了均势供应链及其利润分配机制问题,郑又贤(2005)研究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利益均势协调机制。总之,国内对均势经济问题的研究还只是零星点缀!

② 威廉·鲍莫尔(2002)继承了熊彼特关于创新竞争才是资本主义市场占主导地位的竞争方式的思想,批评新古典微观分析框架没有把创新纳入核心部分。

③ 杨小凯认为,总量供求与价格随着交易效率改进而变化的规律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差别之一(杨小凯,1998:84)。

上是对熊彼特(Schumpeter, 1912: 174)的创新垄断思想的模型化(他认为当企业家通过创新获得超额利润的时候,就意味着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也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生产效率提高与创新垄断形影不离的历史事实的抽象描述^①。(2)用创新垄断反垄断。这里要特别声明,不是不要反垄断,而是要指出,除了传统的反垄断方式外,还有用创新垄断反垄断的这种方式(如微信对电信垄断、支付宝对银行垄断的挑战)。传统的反垄断方式,例如把垄断企业分拆,增强同质产品竞争度,通过降低垄断方的市场势力,向对称性垄断格局靠拢,侧重于利益再分配。而用创新垄断反垄断,是指通过创新,形成异质性竞争,提高非垄断方(或者弱者)的市场势力,与原垄断者(或强者)形成对称性垄断格局,侧重于创新发展。达到完全分工的均势均衡状态时,每个人都是垄断者,改变了他们之间非对称性垄断格局,形成了对称性垄断格局,亦即均势均衡格局。(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虽然达到了生产效率最优状态,但福利不一定均等化。而均势均衡状态,不仅实现了所有分工结构中的最优生产效率,并且实现了福利均等化。这实质上阐明了,在均势均衡状态下可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向均势均衡状态逼近,就是效率与公平不断统一的过程,使创新垄断与生产效率、共同富裕得以兼容。(4)对于实现均势经济,交易效率、创新和产品产业多样化至关重要。专业多样化发展,关键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取决于节省内生交易成本的制度环境,即取决于有利于自由扩展的正义秩序。交易效率提高,促进创新发展;创新发展,促进全社会的专业多样化;社会层面的专业多样化发展,有利于提高个体层面的劳动专业化,整个社会将不断逼近完全分工的均势均衡状态。

五、主要结论

本文秉承亚当·斯密的分工与普遍富裕思想,以分工演化为核心逻辑,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尝试构建基于斯密—杨格定理共同富裕经济理论框架。主要结论如下:

(1)在最低生存条件和损耗系数约束下,自给自足的生产最优产出水平不会超越温饱水平。因此,要超越温饱,迈向共同富裕,深化分工是必由之路和必要条件。精准扶贫应是分工式扶贫,首先帮助贫困者找准分工位置或提高其找准分工位置的能力,将其纳入更为广阔的分工体系中。

(2)分工是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的统一,是生产力水平(亦即供给侧)和共同富裕程度(亦即需求侧)的统一,基于“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的斯密—杨格定理,将正义秩序、生产力水平和共同富裕程度纳入循环累积因果的理论链条中,可以构建共同富裕经济理论框架。

(3)随着交易效率提高,创新不断发展,经济社会将会无限逼近基于劳动专业化和专业多样化不断深化的完全分工的均势经济,拓展创新垄断与生产效率、共同富裕的兼容空间,均势均衡将实现帕累托最优生产效率与社会福利均等化的统一,即在高水平生产力上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改革与政策制定要有利于无限逼近基于劳动专业化和专

^① 威廉·鲍莫尔(2004)对工业革命以来生产率极大提高的解释,正是基于自由市场经济中寡头垄断、创新活动的常规化、生产性的创新精神、法制、技术的自由交易等重要条件。

业多样化不断深化的完全分工的均势经济格局的形成。

参 考 文 献

- Alesina, A. and D. Rodrik, 1994,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 465-489.
- Birdsall, N. and J. L. Londono, 1997, "Asset Inequality Matters: An Assessment of the World Bank's Approach to Poverty Re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2): 32-37.
- Chenery, H. B. and M. Syrquin, 1975, *Pattern of Development, 1950-1970*,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ase, R. H., 1937, "The Nature of Firm," *Economica*, 4(16): 386-405.
- Deiningner, K. and L. Squire, 1998, "New Ways of Looking at Old Issues: Inequal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7(2): 259-287.
- Grossman, G. M. and E. Helpman, 1991,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MIT Press.
- John, F., R. Gustav and W. Shirley, 1979, *Growth with Equity: Taiwan Ca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uznets, 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 1-28.
- Lewis, W.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22(2): 139-191.
- North, D. and R. Thomas, 1970,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 World," *The Economic Review*, 23, 1-17.
- Paukert, F., 1973, "Incom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A Survey of Evidence,"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108, 97.
- 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igler, G., 1976,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Professor Smi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 1199-1213.
- Sun, G., X. Yang and L. Zhou, 2004, "General Equilibria in Large Economies with Endogenous Structure of Division of Labor,"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5(2): 237-256.
- Sun, G., X. Yang and S. Yao, 1999, "Theoretical Foundatio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Networking Decisions in the Competitive Market," Harva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17.
- Tony, A., 2010, "'Universal Opulence': Adam Smith on Technical Progress and Real Wage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7(5): 1169-1182.
- Wen, M., 1998, "Division of Labo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Monash University.
- Yang, X. and R. Rice, 1994, "An Equilibrium Model Endogenizing the Emergence of a Dual Structur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Sector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35(3): 346-368.
- Young, A. A., 1928,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 38(152): 527-542.
- 陈宗胜 2000,《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别的深入研究——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 68—76页。
- 丹尼尔·F·斯普尔伯 2002,《市场的微观结构:中间层组织与厂商理论》张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韩绍凤、向国成和汪金成 2007,《农业多样化与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理论分析、经验证据与国际比较》,《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期 56—64页。
- 李实和赵人伟 1999,《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研究》第4期 3—17页。
- 廖成林和孙洪杰 2003,《均势供应链及其利润分配机制探讨》,《管理工程学报》第4期 83—85页。
- 梅志罡 2000,《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均势型村治——一个个案的调查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72—75页。
- 庞巴维克, 1964,《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威廉·鲍莫尔 2004,《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郭梅军、唐宇、彭敬、李青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闻潜 1986,《论均势市场》,《财贸经济》第7期 33—38页。

- 熊彼特,1990,《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向国成和韩绍凤,2007a,《小农经济效率分工改进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 向国成和韩绍凤,2007b,《分工与农业组织化演进:基于间接定价理论模型的分析》,《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2期 513页。
- 向国成和李真子,2016,《实现经济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社会科学》第7期 58—59页。
- 亚当·斯密,1972,《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杨小凯,1998,《经济学原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杨小凯,2003,《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定胜和杨小凯,2004,《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世界经济》第9期 3—12页。
- 朱有志和向国成,1997,《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启示》,《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20—23页。
- 郑又贤,2005,《略论构建和谐社会的利益均势协调机制》,《东南学术》第6期 11—18页。